



中国图书文化史

主编 曹之

# 中国古籍编撰史

第二版

曹之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  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国图书文化史  
主编 曹之

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# 中国古籍编撰史

第二版

曹之 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  
武汉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籍编撰史/曹之著. —2版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5. 3  
(中国图书文化史/曹之主编)

ISBN 978-7-307-11792-1

I. 中… II. 曹… III. 古籍—编写—图书史—中国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4627 号

责任编辑:严红 李琼 责任校对:刘欣 版式设计:马佳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46.25 字数: 663 千字 插页: 2

版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2 版

2015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1792-1 定价: 13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# 总 序

---

我是一个不好写序的人，尤其不喜欢写代序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，仿佛名角一登场，满场就大喝一声采，何等有趣。倘是戏子，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，自己将‘好’叫进去，待到上台时候，一面一齐开起来。”（《准风月谈·序的解放》）为了回避“吹鼓手”、“戏子”之嫌，我决意不为“代序”，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，包括我指导过的几位博士生。不过，经过解释，博士生们已经理解了我的初衷。导师为博士生写序，似乎成为一种“专利”，我愿意放弃这种“专利”。这篇序言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当了“主编”，总要讲几句话。

人们常用“图书大世界”形容图书之多。的确，世界充满图书，图书充塞世界，图书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。人们常用书山、书海、汗牛充栋、恒河沙数、连窗委栋、擢发难数、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自古以来，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，众多褒贬不一的“读书迷”，有五花八门的称号，清张培仁《妙香室丛话》卷六云：

汉世目郑康成为“经神”；何休为“学海”；晋杜预有“左传癖”，人目之曰“武库”，言胸中无所不有也。江柘目许懋为“经史笥”；梁世目任昉为“五经笥”。褚遂良目谷那律为“九经库”；又目虞世南为“行秘书”，皆美其淹识群书也。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，刘柳惟读《老子》，迪每轻之，柳曰：“卿读书虽多，而无所解，可谓‘书麓’矣。”唐李善淹贯古今，不能属辞，人号“书麓”；齐陆澄世称硕学，读《易》三年，不解文义，欲撰《宋书》不就，王俭戏之曰：“陆公，‘书厨’也。”似犹有讽焉。他如宋宜黄李郭，文学浩博，人号为“书厨”；福清郑格，博闻强记，时亦号“书厨”；莆田李纲，通诸史百家，人亦目为“书厨”；通州张大中，群经百氏，一览不忘，人目为“黑漆书厨”；邛州吴时敏，于为文未尝属稿，人目之为“立地书厨”，明武进陈济，六经子史，无不究竟，时称为“两脚书厨”；南海唐奎，遍览诸书，称为“唐书柜”。或有过誉，要皆美词也。

随便打开一部词典，就会发现由“书”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，如：书卷、书帙、书城、书籍、书笈、书笥、书香、书院、书袋、书钞、书桌、书台、书种、书影、书录、书虫、书囊、书楼、书厄、书跋、书口、书脊、书缝、书祸、书价、书史……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，如读书堂（司马光）、绉书阁（叶梦得）、万卷楼（尤袤）、野史亭（元好问）、汲古阁（毛晋）、赖古堂（周亮工）、士礼居（黄丕烈）、思适斋（顾广圻）、十驾斋（钱大昕）、积古斋（阮元）、四当斋（章钰）、双鉴楼（傅增湘）、瓜蒂庵（谢国祯）……甘桁《斋名集观》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 年版）著录的 1000 多个室名大多与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，如书店、书铺、书局、书肆、书林、编撰、出版、发行、藏书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……三百六十行生意，不少生意和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，如囊萤、警枕、映雪、三余、三上、推敲、祭书、断织劝学、凿壁偷光、一字之师、著书自娱、露钞雪纂、断齑划粥、十年磨一剑、三年不窥园、头悬梁锥刺骨……詹文元等编《勤学成才故

事 160 个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)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,该书第 76 则故事云:唐代武后年间,河阴有位叫郗珍的人,家贫如洗,但酷爱读书。晚上没有灯光,不能读书,非常苦闷。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,郗珍便仿照汉代匡衡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,把透光的缝隙凿大,趴在地上读书,津津有味。后来,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,一纸诉状把郗珍告上官府,诬称郗珍意欲盗窃财物。郗珍实话实说,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,并无他意。县官康庭芝亲自审理此案。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,作出一审判决,在《对求邻壁光判》中说:

郗珍荷衣横带,缉柳编蒲,有贱赢金,将希片玉。南都自富,北郭实贫。殊谢梁鸿,不求因热。乃如苏季,愿借余光。已接武于匡衡,方齐踪于甯越。室仞非邃,未窥夫子之墙;纺绩可兼,辄凿邻人之壁。情非窃伏,事涉穿窬。抑有前闻,宜征故实。请从按记,不合论辜。(《全唐文》卷二百六十《康庭芝》)

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: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。广武,因在黄河南岸,唐称河阴县。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,如周易学、尚书学、诗经学、三礼学、春秋学、史记学、汉书学、尔雅学、本草学、水经学、通鉴学、文选学、四库学、红学、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编撰学、版本学、传播学、校勘学、辨伪学、辑佚学、阅读学、目录学……随着时间的流逝,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,学中有学,学又有学,子又有孙,孙又有子,子子孙孙,无穷匮矣。

历代图书知多少?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。就拿线装古籍来说,我在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第二版(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)中曾据下列数字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:

(一)上海图书馆编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著录丛书 2797 部,子目 7 万种,去其重复,计有单种文献 38891 种;

(二)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 1 万种；

(三)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，据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与《贩书偶记续编》著录，计有 1.6 万种；

(四)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共著录方志 8200 种；

(五)佛经单种文献 4200 种；

(六)道藏单种文献 1500 种；

(七)据全国 59 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《中医图书联合书目》著录，中医单种文献约有 7661 种；

(八)碑帖、舆图不少于 1 万种；

(九)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不少于 1 万种；

(十)车锡伦编《中国宝卷总目》著录成代宝卷 1579 种；

(十一)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《中国家谱综合目录》著录家谱 14719 种；

(十二)谢巍编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》著录历代年谱 6259 种；

(十三)许保林编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存世兵书 2308 种；

(十四)杨忠、李灵年编《清人别集总目》著录清人别集 4 万种；

(十五)王宝平等编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著录和刻本 3063 种。

以上 15 个数字相加，共得线装书 174380 种，去其重复（还有少数现代著作、平装图书等），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，总数当不少于 15 万种。如果加上复本，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，当不会少于 1000 万册。历时 15 年编撰成功的《四库全书》收书 3503 种、79337 卷，共计 9.97 亿字。18 世纪中叶，法人狄德罗主编的《百科全书》共计 2268 万字，《四库全书》是它的 44 倍。若把《四库全书》约 4000 万页逐一摊开，首尾相接，可绕地球赤道 1.34 周，简直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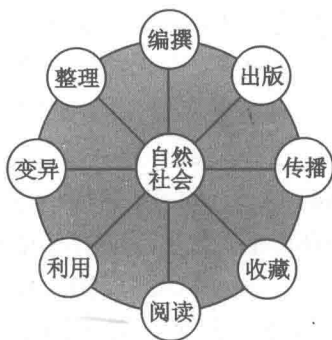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天文数字。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。实际上，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：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。二者相比，由于自然老化、天灾人祸等原因，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，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。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，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，无功而返。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“浩如烟海”四个字作为结论了。

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，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，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。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，没有“单干户”。现在，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，出版专业有“古籍编撰史”、“古籍出版史”等；图书馆学专业有“古籍分类”、“古籍编目”等；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“古籍校勘”、“古籍辨伪”……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，壁垒分明，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大有中分天下、一决雌雄之势。静言思之，这些学科局于一隅，实则专科文献学，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。对于各个专业来说，从微观上划分“势力范围”，固然需要，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，也不可少。只讲微观，不讲宏观，容易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中国有句俗语：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局者“迷”在微观，旁观者“清”在宏观。从横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大千世界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；从纵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悠悠岁月，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。“当局者”跳不出一地、一时、一人、一书的狭小范围，不能耳听六路、眼观八方，不能“会通”地研究问题，因而迷惑不解。苏轼《题西林壁》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首诗是“当局者迷”的形象写照。

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，经由图书出版、图书传播、图书收藏、图书阅读、图书变异、图书整理，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。其中，“传播”包括书业中心、畅销书、中外交流等；“收藏”包括目录、分类、保护等；“阅读”包括标点、训诂、检索、翻译等；“变异”包括伪书、散佚等；“整理”包括校勘、辨伪、辑



佚等。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、环环相扣、周而复始、螺旋式上升、不断发展的历史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基于上述认识，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“中国图书编撰史”、“中国古书编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官修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序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抄写史”、“中国印刷术的起源”、“中国图书刻印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版本学”、“中国图书装帧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插图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发行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广告史”、“中国古代禁书史”、“中外图书交流史”、“中国古代聚书史”、“中国秘书省藏书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散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目录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分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保护史”、“中国图书阅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训诂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翻译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整理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校勘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辨伪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辑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”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。

作为教师，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、读书、著书、教书的一生。生活就是图书，图书就是生活。用“嗜书如命”四个字来形容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除了文盲，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，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。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，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。图书，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；图书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爱书吧，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鲁迅先生也很爱书，他说：

该如爱打牌的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打，连续的去打，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，放出来之后还是打。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。牌有怎样的有趣呢，我是外行，不大明白。但听得爱赌的人说，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，永远变化无穷。我想，凡嗜好的读书，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。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。（《而已集·读书杂谈》）

早就想编一套关于图书文化的丛书，表达我们对于图书的无限感激之情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次收入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暂时只有以下 13 种著作：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（一）《中国古代图书史》   | 曹之著     |
| （二）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   | 曹之著     |
| （三）《中国古书编例史》   | 马刘凤、曹之著 |
| （四）《中国图书官修史》   | 霍艳芳著    |
| （五）《中国古籍序跋史》   | 王国强著    |
| （六）《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》 | 王国强等著   |
| （七）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  | 曹之著     |
| （八）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   | 曹之著     |
| （九）《中国图书发行史》   | 孙文杰著    |
| （十）《中国秘书省藏书史》  | 郭伟玲著    |
| （十一）《中国图书散佚史》  | 李玉安著    |
| （十二）《中国古代的藏书印》 | 吴芹芳等著   |
| （十三）《中国古籍校勘史》  | 罗积勇等著   |

其中，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、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和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三书已于多年前出版，社会反映尚可。武汉大学出版社坚持要把三书纳入该丛书一并出版，我也只好遵命，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美意。该丛书作者大多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，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，有的已是教授（研究馆员）或博士生导师，且已出版过多种著作，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写作经验。2007 年年底，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初定书名、著者之后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。

几年来，作为主编，我做了以下事情：（一）草拟分册提纲。提交编务会议进行讨论，以期集思广益，统一认识。（二）编制《中国图书文化史资料索引》。把知见材料公布于众，按照内容发给著者参阅。（三）举办小型资料展览会。2008年3月至4月30日，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举办了一次小型资料展览会，我把自己的部分读书笔记《目耕录》42册、剪报资料《刀耕录》40册和私人藏书97册，面向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著者公开展出，读者可以抄写、复印或拍照。资料者，天下之公器也。这样做，是为了方便大家，资源共享。（详《图书情报知识》2008年第3期卷首语）（四）互通情报。著者遇到什么问题，可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向主编反映；主编如有什么新的想法，或有什么新的“发现”，可随时向著者“通气”。（五）借阅图书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著者随时可以向主编借阅有关资料，主编藏书犹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“资料室”、“图书室”，全天候面向各位著者。（六）从2007年年底到2011年，先后八次召开编务会，并印发会议简报。每次会议重点强调两个问题：一是抓紧时间，时不我待。既然我们已经签订合同，作出承诺，就要做到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。二是创新意识，宁缺毋滥。大家认为，如果没有创新之处，宁可不写，不能徒灾梨枣。大家一致表示：要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，珍惜这次机会，精心打造传世之作。否则，无法向读者交待，无脸见“江东父老”。此外，还就书名、编例具体问题展开讨论，统一认识。不过，还要说明两个问题：一是关于时间下限问题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时间下限一般定在辛亥革命（1911年）清代灭亡为止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个别图书的内容或超越此界。二是关于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整合问题。由于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内容较广，涉及问题较多，加上各位著者认识水平不一，各书之间或有重复，间有不大统一的地方，敬祈读者谅解。当然，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，还没有形成共识，著者各抒己见，也算是“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”吧！

现在，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终于出版了。我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，没有各位著者的密切配合，编制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。我要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

院、武汉大学出版社，没有它们的鼓励和支持，编制这套丛书也是不可能的。谢谢大家！

曹 之

2012年3月10日

## 第二版自序

---

重视著书立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。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不乏学术精品，这些学术精品的产生与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密切相关。

曹丕曾经说过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（《典论·论文》）这是古人传世意识的最明确的表述，刘勰、刘知几等人都有类似的说法。为了作品传世，古代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：汉代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，蒙受了深重的灾难，“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肤，受榜箠，幽于圜墙之中”，面对残酷的宫刑，是引决自裁，还是忍辱负重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，他说：“所以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，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只要作品能够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，“虽万被戮”，也不后悔。司马迁的传世意识于此可见。唐代白居易的传世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（一）自编诗集十余次。为了防止丢失，每隔数年，白居易就

要及时整理自己的作品，编集成册。其编集次数之多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。（二）每次自编诗集之后，都要抄写复本。太和三年（829年）编《刘白唱和集》抄了两个复本；开成四年（839年）编《白氏文集》，抄了三个复本；会昌五年（845年）编《白氏文集》，竟然抄了五个复本。为什么要抄复本呢？只有抄写大量复本，才能确保永久流传。（三）将复本珍藏寺院。如开成四年（839年）所抄的三个复本，一本藏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；一本藏庐山东林寺经藏中；一本藏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。会昌五年（845年）所抄的五个复本，其中三个复本仍然分藏以上三所寺院。为什么要藏到寺院呢？因为寺院远离红尘，几与外界隔绝，比藏在其他地方要安全得多。（四）白居易的“年岁诗”和“官秩诗”也体现了他的传世意识。据统计，白居易作品中有77处“年岁诗”和“官秩诗”，如“已年四十四，又为五品官”，“身为三品官，年已五十八”等。为什么要把年岁、官秩写入诗歌呢？当然是为后人着想，为后人研究他提供可靠的资料。也就是说，白居易拿笔写诗的时候，已为后人研究他作好充分准备，以免后人东奔西跑，找不到资料。（五）晚年特制柏木书柜，收藏文集。其《题文集柜》诗云：“破柏作书柜，柜牢柏复坚。收贮谁家集？题云白乐天。我生业文字，自幼及老年。前后七十卷，大小三千篇，诚知终散失，未忍遽弃捐。自开自锁闭，置在书帷前。身是邓伯道，世无王仲宣。只应分付女，留与外孙传。”这是白居易生前为了永久保存文集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。在封建社会，只有男孩才是父母财产的法定继承人，而白居易有女无男，也就意味着文集无人可传。尽管如此，晚年的白居易还是自我解脱，用坚实的柏木做了一个书柜收藏文集，将来让出嫁的女儿“留与外孙传”，也不失为一种流传方式。如此种种，都说明白居易具有强烈的传世意识。宋代郑樵著书千卷，千里迢迢，抱着书稿从福建莆田老家跑到临安献给皇帝，希望将其收藏在国家图书馆。他在《上宰相书》中说：“樵暮龄余齿，形单影只，铅槧之业甫就，汗简之功已成，既无子弟可传，又无名山石室可藏。每诵白乐天‘恐君百岁后，灭泯人不闻。赖中藏秘书，百代无湮沦’之句，未尝不呜咽流涕。会兹天理不

负夙心，仰荷钧慈果得就秘书省投纳。蓬山高迥，自隔尘埃，芸草芳香，永离蠹朽，百代之下复何忧焉。”可见他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“赖中藏秘书，百代无湮沦”，说明郑樵的传世意识也是很强烈的。

晋代杜预好后世名，“刻石为二碑，纪其勋绩。一沉万山之下，一立岷山之上，曰：‘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？’余尝守官襄阳，求岷山之碑，久已不见；而万山之下，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，屡已迁徙，石沉土下，那有出期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”（庄绰《鸡肋编》）。石碑传世，需要一定的条件，杜预的希望终于落空了。传世意识只是一种主观愿望，能否传世，还要看作品本身是否精品，尚需读者的选择，历史的评判。古往今来的不少学者深谙此理，为了著作传世，千方百计地打造精品，他们呕心沥血，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正如司马迁所说：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是的，古代不少学术精品，是“发愤”之作。司马迁《史记》由其父子相继完成，前后历经17年。司马迁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终于完成了这部万古称颂的传世佳作，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白居易为了打造精品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他的诗歌经常念给老太太听，听不懂就反复修改，直到听懂为止。他的诗稿写成以后，总是不断修改，“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”。他要求后人在编其作品时，把那些“率然成章”的不经意之作，一概删去，毫不留情。他曾对好友元稹说：“凡人为文，私于自是，不忍于割截，或失于繁多。其间妍蚩，益又自惑，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，讨论而削夺之，然后繁简当否，得其中矣。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这就是说，诗文写好之后，必须请毫不姑息迁就的诤友“讨论而削夺之”，才能提升作品的质量。白居易不愧为唐代著名诗人，他创作了大量诗文精品，与元稹、刘禹锡并称，影响一代诗风。郑樵为了打造精品，谢绝人事，隐居夹漈山，结茅苦读三十

年：十年攻读经旨之学，三年攻读礼乐之学，三年攻读文字之学，六年攻读天文、地理等学，八年攻读讨论、图谱等学，以三十年之功完成了《通志》这部学术名著，其中《通志·校讎略》对古代书目编纂进行了全面总结，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他的“会通观”和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实践活动，对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。在中国古代，像司马迁、白居易、郑樵这样打造精品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一部中华民族的学术史，就是代代学人打造精品的历史。“十年磨一剑”正是古人打造学术精品的形象写照。他们为了打造学术精品，付出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扬雄《方言》用时 21 年；王充《论衡》用时 31 年；班固《汉书》用时 28 年；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用时 21 年；陈寿《三国志》用时 23 年；杜佑《通典》用时 35 年；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用时 18 年；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用时 40 年；洪迈《容斋随笔》用时 20 年；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用时 30 年；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用时 40 年；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用时 30 年；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用时 24 年；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用时 52 年；桂馥《说文义证》用时 40 年；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用时 30 年；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用时 30 年；王筠《说文句读》用时 30 年。实践表明，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是互为因果的关系：一方面，传世意识可以激发精品意识，从而促使作者真正打造学术精品；没有传世意识，就不会有精品意识，也就不可能打造学术精品。另一方面，精品意识造就学术精品，才能真正达到传世的目的；没有精品意识，就不可能打造学术精品，也就不可能达到传世的目的。那些为了混职称、捞稿费的人，既无传世意识，就不可能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严谨治学态度打造精品，就只能大搞短平快，甚至以抄袭为能事，一年磨十剑，生产覆瓿之物，也就不可能传世。疾行无善步，书多必不工，前人的教训值得注意。

为了打造学术精品，古代不少学者迟迟不肯将作品付诸梨枣，竟至于生前不得获睹作品传世，含恨九泉。司马迁死后 18 年，《史记》才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；徐光启死后 6 年，《农政全书》才得以付梓刊行；李时珍死后 3 年，《本草纲目》才得以出版发



行。汉代王充的《论衡》100年后才被蔡邕发现，在洛阳正式出版；唐代黄滔的《黄御史集》，200年后，才由其孙正式出版；宋代王应麟的《困学纪闻》，30年后才得以正式出版。宋代预修《资治通鉴》的人，生前大多没有看到该书出版，范祖禹《范太史集·答刘仙尉书》云：“近《资治通鉴》印本奏御，因思同时修书之人墓木已拱，存者唯仆，尤可感叹！”另外，《汉书》的著者班固、《后汉书》的著者范曄、《史通》的著者刘知几、《国榷》的著者谈迁、《校讎通义》的著者章学诚等生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著作行世。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：古人著书皆用手写，几十年如一日篝灯呵冻，露钞雪纂，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，甚至死时还看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传世。今人手敲键盘，日可数万字，如入幻境。我常常这样想：假如古人有一台电脑，他们当会怎样呢？我们生逢网络时代，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我们应当珍惜今天，学习古人，借古鉴今，怀着浓重的传世意识，用键盘敲出更多的学术精品。这就是我撰写本书的目的。

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9年，其出版过程历经五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资料准备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我翻阅了大量古今图书，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。第二阶段为设计大纲阶段。全书拟分两编：上编以时为序，纵向研究，历述各代图书编撰历史；下编以专题为序，横向研究，详陈图书编撰的若干焦点话题。全书纵横交错，试图对古代图书编撰进行一次粗线条的描绘。第三阶段为写作阶段。我把全书的主要内容化整为零，分为40个专题，然后各个击破。先后撰写并发表了40余篇论文，这些论文自成系列，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。第四阶段为汇总阶段。40个专题一一解决之后，汇而总之，重新修改。有的专题根据新发现的资料，甚至从零开始，另起炉灶。“百里路，半九十”。汇总阶段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懈怠情绪，一鼓作气，坚持到底。在修改过程中，古人那种“十年磨一剑”的严谨治学态度时刻激励着我，我决心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。有些内容甚至再三再四地修改，直至满意为止。有时为了一个字的版本问题，多次到图书馆核对原文。1998年前后，我的双眼白内障已发展到不能正常读书学习的地步，但是想到